

中国语文教育

忧思录

王丽 编

女儿的作业 邱静之

中学语文教学手记 王丽

文学教育的悲哀 薛毅

语文课：我们失去了什么 杨东平

教育科学出版社

G633.3

W34

■ 中国语文教育

王
丽
编

优
思
录



A0874403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王丽编.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8. 11 (1999. 10 重印)

ISBN 7-5041-1837-0

I. 中… II. 王… III. 语文课-教学改革-中小学-文集
IV. G633. 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838 号

责任编辑 韦 禾.

责任印制 尹明好

责任校对 徐 虹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 4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市胶印厂印装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201 千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18 001—24 000 册 定价:14.50 元

我的教育梦 ——代序

王 丽

五年前，一次普通的颈部手术，使我意外地失音了。我惊惶、哀伤、绝望。我想，我再也不能教书了，再也不能站在讲台上，面对一双双星星般明亮的眼睛，用我的声音开启他们心灵的窗户，引领他们进入一个广阔而充满诗意的世界……

也许是我的企求感动了上苍，大约过了半年多，我的嗓子又奇迹般地恢复了，那时，我已从家乡浙江来到北京读研究生。

我原先教书的学校是省重点师范，有着美丽的校园和优良的教学设施。可是，当两年的研究生学业结束后，北京以其泱泱大国之都独具的魅力吸引着我，我很想体验一下在北京当教师的滋味。在一位长者的引荐下，我进了一所市重点中学教高中语文。尽管我只是这所学校一名招聘的教师，但我仍然感受到重回讲台的喜悦。在我心中，教书，并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它更寄托着我的一个梦——一个凝聚着我的爱、热情和人生理想的梦。我以为，教育的本质和真正价值在于将人类无数个世代积累下来的文明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并不断为它添加新的辉煌。从这个意义上，教育本身便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

因此,在我看来,语文课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教给孩子某种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篇篇凝聚着作家灵感、激情和思想——代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文字,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情感、情趣和情操,影响一个人对世界的感受、思考及表达方式,并最终积淀成为他精神世界中最深层最基本的东西——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以为这才是语文课的特殊意义所在。

当我来到北京这所中学时,我就是按照自己这种对语文课的理解来设计我的教学。我教高一两个班语文。我很快发现,这些京城长大的孩子视野开阔、思维活跃,且特别容易接受新事物。这使我们很快达成沟通。他们非常欢迎我这种打破常规的、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教学方法。然而,与此同时,我也比过去更加痛切地感到我国语文教育中的积弊之深,从教材、教法、训练到考试,都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尤其是近些年引进计算机改卷和标准化考试后,试题越来越刁钻古怪,花样更层出不穷,简直达到了故意折磨人、捉弄人的程度,而且答案越来越僵死,完全背离了语文课的本义。为了对付这种考试,学生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力去进行“应试训练”;而身为语文教师的我,也不得不违心地将课本和教参上的一些我认为是荒谬的东西灌输给学生。这样做常常使我十分苦恼。幸而孩子们都能体察我的苦衷。在他们的积极配合下,我尽量在“应试训练”之余,寻找一块能够实现我心目中语文课的价值空间。我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语文课不但成为我和孩子们相互交流的一块精神园地,而且在期末的考试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然而,由于学校人事变动,一个学年结束后,在孩子们的泪光中,我离开了这所中学。那些日子,我的情绪十分低落。我觉得,我对教育的热忱也许一去不复返了,我心中的教育梦已经破灭。那时,我常常跟我的朋友、《北京文学》执行副主编章德宁女士谈起我的感受。

没想到，事隔一年，也就是1997年9月，章德宁打电话来向我约稿，问我能不能写一篇关于中国语文教育问题的文章。她觉得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答应了，但过后又有些疑惑：当今之世，究竟有多少人会关心这些问题呢？不过，我还是全力地投入这篇文章的写作中，我将它作为一篇叙事带抒情又略加议论的文学散文来写。我觉得惟有如此才能表达多年来我对中国语文教育的感受和思考。

这里，我想我应当特别感谢《北京文学》编者的胆识和创意，他们将我应约写的这篇题为《中学语文教学手记》的散文与另外两篇文章（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编发在一起，在1997年第11期《北京文学》的“世纪观察”栏目中推出。由于这三篇文章在内容性质和思想上有其内在的联系，也由于这个栏目的重要性，这三篇文章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下子引起全国性的强烈反响，多家报纸和电视台纷纷予以转载和报道。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还就语文教育问题组织了讨论，并请我去当“嘉宾”。《北京文学》和其他报刊接到大量读者电话和来信，几乎所有的人都发出强烈的呼声：中国语文教育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紧接着，北京、上海和其他省市很多报刊都相继开辟专栏就语文教育问题组织讨论。

与此同时，由于上海一位市民将《新民晚报》上转载的我的那篇《中学语文教学手记》和邹静之先生的《女儿的作业》寄给李岚清副总理，这件事终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李岚清副总理批示教育部对语文教育问题进行调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立即将我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全文复印发给有关人员，并召开有关会议，邀我出席。

这一切使我感奋、欣喜，也是我始料所不及。然而，我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我国现行语文教育积弊既多且深，改革必将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它首先需要对现状进行认真彻底的清理和反思，

才能找出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当然不是仅仅依靠中小学教育界自身所能完成的，而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整个文化学术界具有远见卓识之士的参与，以期在开诚布公的讨论中集思广益，提供国家决策部门参考。基于这一想法，我决定先从京沪两地开始，对全国著名学者教授进行采访，以访谈录的形式予以发表。

我的这个设想得到了《北京文学》和科利华软件集团的支持。从1998年4月开始，我走访了京沪两地将近20位学者教授，其中有11篇访谈录已整理成文，于1998年7月号和10月号的《北京文学》陆续刊出。出乎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的是，学者教授们对我的采访都表示理解和欢迎。尽管我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素不相识，但他们在电话中一听我的来意，几乎都是一口答应接受采访，其当仁不让、义不容辞之情溢于言表。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上海文化老人、年届92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平日深居简出，很少见客。当我在电话中说明来意，保姆告诉他时，老先生慨然允诺。那天下午我去时，老人大声吩咐保姆：“今天下午有人来，就说我身体不好躺在床上！”我听了直想笑——多么可爱的老人！我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的童庆炳教授，他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老师，也是我这回采访的第一位学者。他不但为我的采访做了认真的准备，谈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而且还为我出主意，亲自打电话、写信帮我联系别的学者，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先生和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先生，他们都尽其所能地给我以帮助，使我的采访得以顺利进行。

在采访过程中，师长们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忧虑焦灼之情令我一次次地感动，而他们的真知灼见更使我获益匪浅。历时两个多月的采访，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精神历程，也使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有了更深的体认，并由此而看到中国教育改革的希望所在。

自从 1997 年 11 月号《北京文学》发表上述三篇文章后, 1998 年 3 月号又编发了一组三篇讨论语文教育的文章, 加上 7 月号发表的四篇和 10 月号发表的七篇我采写的访谈录, 以及我所见到的京沪等地报纸上发表的一些讨论文章, 我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近年来我国教育文化学术界对语文教育的看法。因此, 我以《北京文学》上发表的有关文章为主, 并适当选取其他报刊上的有关文章, 编为一集, 以供关心这个问题的各界人士和广大读者参阅, 并进一步展开讨论, 把我国语文改革事业引向深入。因本书各篇在内容上大都涉及对现行语文教育积弊的思考, 故题书名为《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

另外, 为了使行外人对语文考试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特将 1998 年高等院校招生语文试卷作为附录。据说, 比之往年, 这份试卷已作了相当程度的改进。

当我编完这本书时, 新的学年即将来临, 许许多多的孩子将跨入小学和中学, 开始他们人生最初阶段、也是最重要的学习生活。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一个文学写作者和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 我祝愿我们的孩子所接受的语文教育能够给他们的一生带来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 祈愿我的“教育梦”能梦想成真!

女儿的作业

邹静之

过元旦时，女儿的语文作业，有一项是把综合练习作业本重抄一遍，从题到答案一字不落地抄，大概有一万来字。此为三项作业中的一项，女儿学会了熬夜，元旦那天写到凌晨3点。女儿六年级。

昨日看到一幅画，题目是《陪读》。儿子深夜在写作业，父亲在叠高的椅子上，发悬于梁，满地烟蒂，苦熬等孩子作业写完，是个好父亲。现在某些教师的能力已经深入到了家庭。听一朋友说，家中电视从不敢看，曾遭过孩子老师批评，说孩子苦学，家长看电视，不是为父之道。这样的老师大概能使整个家庭都笼罩在苦读的氛围中。

我不是个好父亲，我先是没头悬梁，陪女儿深夜写作业的精神；再有，她的作业，我也大多不会，陪也帮不上忙。我没想到语文的教法已经深入细致到字典词典内部中去了。女儿的作业要花很多时间来分析字，如：“瓮”是什么部首，它的第七划是点还是折，它的声母是什么，它的韵母是什么，它有多少义项……。这很像在抢辞学家的活，

我不知道学得好的同学是否已经是半个文字学家了。也许我们需要全民族都成为文字学家，把一部部字典都装进心里。我曾对女儿说这没用，你学会查字典就够了，字典是工具，而你不必成为工具。女儿不听，她尊师敬道。

有一天，她问我“灰溜溜”怎么解释。我想了一会儿，问干吗解释这个词。她说是作业。我说这个词你会用吗？她说会，很快造了句子。我说这就可以了，关键是会用。解释“灰溜溜”这种词毫无必要，就像解释“馒头”这个词没有必要一样。女儿不屑，她认为我从没有学好过语文，连小学的问题都答不出来。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每个词是否都有再用语言来解释一遍的必要。如果不是，就该放孩子们出去玩玩。我想小到“灰溜溜”这类词，也要用书面语去说它一遍了，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学的东西就太多了，我们确实不必在“灰溜溜”面前灰溜溜。

每临考试，回家的作业，大多是做卷子。卷子很长，女儿她们称其为“哈达卷”，挺准确，像一条长长的哈达，从桌子上拖了下去。她吃完晚饭就俯在上边写，一条“哈达”写完了还有一条。有时我路过她的房间，她的影子借台灯的光投在天花板上，那影子没有什么光彩。我从没有借这个影子想像出过什么杰出的人物来，没有爱因斯坦，也没有惠特曼。我的感觉是一个作坊里的小工在于她最厌烦的活。我曾看过她的数学作业，对格式和步骤要求十分严格，不厌其烦，明明可以综合列式子的，也要求分步；一个式子之后还要有语言阐述（干吗非要把简单的复杂化，他会做就证明他是明白、清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把聪明的孩子们当成白痴来教。他们其实非常灵动，他们比我们想像的机敏得多，但我觉得那种教学好像就是非要压制住他们的活跃。很多时候这样的教学像是想验证一下谁更按部就班，谁更能掌握僵死的程式。

有一次，经我检查过的语文卷子错了很多，不仅是家人，我

也开始对我的语文程度怀疑起来。有两条错误是这样的：题目要求，根据句子意思写成语，有一条是“思想一致，共同努力”，女儿填“齐心协力”，老师判错；还有一条“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女儿填“栩栩如生”，老师也判错。我仔细看了，不知错在哪里。女儿说第一条应是“同心协力”，第二条应是“惟妙惟肖”。这真让人吃惊，我不知道“齐”与“同”在这儿有什么区别。按《新华字典》“齐”字第三个义项就是同时、同样、一起的意思，并举例用了“同心”一词。该用“同心协力”时，用“齐心协力”谁能说这是错了。女儿说：标准答案是“同心协力”，其他当然就错。真可怕，语文什么时候变得比数学还要精确了。中国语言之丰富，词汇之多，所谓同义词，近义词，相应的不止一条，怎么会就有一个答案呢。那第二条，我觉得题目的意思，栩栩如生甚至比惟妙惟肖更为准确，“妙”和“肖”与“如生”比，哪一个更与“逼真”这个词接近呢。关键争执还不在此，把对的说成错的，就不仅是误人了，实是害人了。还不止害一个人，而是害了一代人。实际也这样，我反复怎么说这两条都没有错，女儿也不信，她视老师为绝对权威，老师以标准答案为圣旨。女儿把她原来活跃、灵动的心收起来了。从她心里把那两个词赶出去了，她将接受别人给她的标准，来谨慎地使用词汇，她以后可能会像收音机一样地说话。那天，她按老师的要求把那错改了十遍。我那一刻心里只有一个词——残酷。

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

我不知道“挤眉弄眼”为什么只能算神态类的词，而就不能算是动作类的词，神态和动作清楚的界线在哪儿。我也想不通“意外的灾祸或事故”的意思只能是“三长两短”。我最想不通的是考学生这个有什么意义，把一个词归于神态，或把一个词归于动作，对他应用这个词有什么作用。除限制别人的想像外没一点儿好处。古语说“文无定法”，如果真有那么死的标准，谁能学会为“推敲”而推敲呢，诗人大概也不会再说“疑是银河落九天”这

话了。

最奇怪的是，语文到这程度，女儿的作文反而越来越差。她的作文几乎成了一些儿童八股的翻版。我的曾写过“圆珠笔在纸上快乐地蹭痒”这样句子的女儿，开始为作文编造她的故事，她非常熟悉表扬稿和思想汇报那类的文体。她的作文几乎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这样的格式，去到老师那儿领一个好分。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谁是傻子”。（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女儿说她们班的同学，写作文常找来相应的一篇，改个名字抄上去。）这类的书在我家附近的一间新华书店占了有几张柜台，买者踊跃。那些父母并不知道真写好作文的人，并不是看这些书看的。那天，我同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柜台上认真地读《高老头》，问她为什么不买回家去读。她奇怪地看着我，说这样的书怎么可以买回家呢。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在“文革”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看白居易。谈到希望，再也不敢想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句子来了。好像是文化提高了，好像是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

“希望工程”是为了救助那些失学儿童的，而我发现很多上学的儿童他们极想失学。女儿说一想到作业就要发疯，她们厌恶把她们当做傻子来教。她们不想学那种一时有用（考试一时），一辈子没用的东西，她们讨厌那个把简单复杂化的教法。她们讨厌作业，讨厌考试，她们讨厌评分不公正和狭隘。她们厌学。

我也讨厌这样的学习法，我一直把家里深夜了还有一个在写作业的学生，当成是这个家庭的灾难（听朋友说，她高中的儿子，从没有12点前睡过觉，想想真可怕）。我真是对她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作业深恶痛绝。我已经多次地怂恿她不写那些东西，就是不写，那实在是对人的智力的污辱。

这是我在两年前写的一篇文章，现在女儿已经上初二了。她的作业量没有任何改变。我家住在六楼，她每天回家的脚步声非常沉重，我知道那声音一大部分来自那个书包。我曾经幻想过把一个快乐轻松的女儿放进家门，而把那个书包关在门外，但那样的日子从来没有一天来到过。很多有儿女还在上学的家长跟我说过，一家中最辛苦的是孩子，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但就是这样，别的科目我不敢说，就文学而言，我相信这些苦难的孩子们并没有学到什么。我的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外甥女，就基本没有写作能力，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重点学校，她写作文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在她的文章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心里话。很多人已经把文学看成是一个附属的令人厌倦的东西了。这与使人生厌的语文教育是分不开的，我坚信如果按教科书中的方法来写作或欣赏文学作品，那将离文学越来越远。

（作者单位：《诗刊》杂志社）

中学语文教学手记

王
丽

前年夏初,当我收拾起我的教科书、我的备课本和我平时在学校用的一应物件,走出H中学那带着19世纪欧洲风格的铸铁镂花大门时,一个意识浮上我的脑际:我的教师生涯也许就此结束了,我对这份职业的热忱、灵感和骄傲将永远留在H,再也找不回来了。我无法想像我还能在另一所学校,面对着另一群孩子,重新开始我的讲台生涯……

我是经一位长者的引荐来H中学当代课教师的。那时我刚从文艺学硕士研究生班毕业,在浙江老家曾当过12年中学和师范学校语文教师的我,最后还是选择了重操旧业。这不光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职业——喜欢它带给我的尊严感和年轻感,也不光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更重要的是,我想体验一下在北京当教师的滋味。

说起来,我的运气还真不错。我所任教的这所中学不仅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而且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牌中学。其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创办于1871年,在中国教育史上曾一度与燕京、金陵、圣

约翰这些名牌学校齐名。一百多年来,它虽历经沧桑变迁,但至今仍然保持着历史名校所特有的雍容大度和既古老又青春永在的风范,一如校门口花坛中央那口被芊芊芳草围绕着的古老的校钟。

我教的是高一两个班的语文课。

上过几堂课之后,我开始觉察出 H 中学的学生与我以前教过的学生的差异来。也许是从小生长在我们这泱泱大国的京都,“早充观国宾”(杜甫语)之故,H 中学的学生显得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敏锐、内心更丰富也更有激情,且特别富于幽默感和善于言词。总之,在他们身上,有一股京都长大的孩子特有的气质——当然,这与他们大都来自文化层次较高的家庭和从小学到初中受过较好的教育有关。

这一切加快了我与他们的沟通。在课堂上,我鼓励他们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展开讨论。我们的讨论常常从课文内容出发联系各种社会现象,从学雷锋运动到当前社会上屡见不鲜的见死不救的不道德行为,从日本政府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到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从金庸小说到流行歌曲……在讨论中,我和学生们似乎达成一种共识:语文课本身就像生活一样丰富多彩,不关心广阔的社会生活就很难学好语文。

然而,我也很快深深地感到苦恼。

首先是教材的陈旧、落后。在高一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真正从语文的角度来编选的篇目大约只占一半,其余一半则大体上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考虑的,而且还是五六十年代那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即便是写景抒情文章也是如此。如第一单元选的三篇散文:《雨中登泰山》《长江三峡》《难老泉》,均作于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其思想意蕴都明显打上那些年代的印记。另外,像报告文学这种注重新闻性、现实性的文体,课本中选的仍然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篇 50 年代的

作品,真令人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感。

记叙文是如此,议论文的情形也许更糟。除了领袖讲话和鲁迅作品之外,其余几乎都是一些人云亦云、毫无新意的平庸之作。而更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总共 28 篇课文中,竟没有一篇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议论精辟、文字精彩的作品。仿佛使用这本教材的老师和学生不是生活在 20 世纪末,而是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人!后来,我还找了高中其他年级的语文教材来看,情形也大同小异。

面对着这样的教材,我常暗自发问,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累深厚,从古到今,名篇杰作举不胜举,挑出几十篇上百篇适合中学生读的,绝非难事,为什么偏要选一些如此陈旧、平庸的作品塞给学生们呢?

但我别无选择。我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一方面要考虑到学生应付考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尽到自己的责任,教学生分辨哪些是真正的名篇杰作,哪些只不过是平平之作。如教第一篇《雨中登泰山》,我没有按“教参”的讲法一味说好,而是在肯定了文章的可取之处后,又谈了自己的看法:写景有堆砌罗列之嫌,太“死”、太实,缺乏意境和神韵;文章意蕴不深、不丰富,缺乏让人回味的东西,且全篇找不出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精彩之笔,更谈不上有鲜明的特色。

学生们愕然了。他们从小学到初中,从没听过一位语文教师如此评论一篇课文。在他们的印象中,凡选进课本里的文章都是无可挑剔的,尽管他们自己并无这种体会,甚至没兴趣去体会。但我这种讲法却使他们觉得十分新鲜,他们的兴趣反而被激发起来。时间一长,他们也渐渐领悟到如何用自己的眼光去判别一篇作品的高低优劣。

没想到教材给我带来的更大的烦恼还在后头。那就是课后练习的编排设计。为了省事,还是举《雨中登泰山》一课的练习为

例吧。其中有这样一道思考题：

课文处处着眼于一个“雨”字，创造了“人朝上走，水朝下流”的诗一般的意境。作者下笔是怎样点雨的？收笔又是怎样点雨的？这样写有什么作用？

姑不论“人朝上走”云云天晓得会是什么“诗一般的意境”，单说我加重点号的这些问句，我敢断言此文作者李健吾先生是肯定答不上来的。而且，任何一个作家在写作时都绝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换言之，只有自己是毫无写作经验的人才会想得出这样荒唐可笑的问题；而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教材中比比皆是！每次遇到这样的题目，我都是尽力克制住内心的反感，将“教参”上的所谓“标准答案”抄给学生，以便他们将来应付考试。

相比之下，上述这类题目还不算是最离谱的，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时下流行的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题。仍以《雨中登泰山》一课为例，请看题目如下：

四、下面是课文中的一段话。后面列出四种分析。把最能确切反映作者意图和表达方法的一种选出来。

……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的境界的，却是那些“吸翠霞而天矫”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隙缝，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枝叶，像是和狂风乌云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都让你觉得它们是泰山的天然的主人，好像少了谁都不应该似的。

1. 作者运用借代、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在逆境中奋斗的自豪感和旺盛的生命力。

2. 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的千姿百态、各具情趣的自然景色。

3. 作者运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方法，表现了松树在逆境中